

人口“逆淘汰”：一个事实抑或一场虚惊

——兼评近年有关人口“逆淘汰”的一些流行观点

穆光宗

本文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时下众说纷纭的人口“逆淘汰”问题。作者认为，与其说中国存在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不如说是人口的“逆淘汰”来得准确，并据此明确界定了讨论对象。作者对以往论者所假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提出三点质疑，认为不能用生育率的相对差异去简单替代人口素质本身的诸多差异，这是必须澄清的一个基本认识。再者，本文的分析表明：局部地看，“逆淘汰”问题理当引起关注，但从全国范围看，没有理由认为“正淘汰”不是主要的（人类文明史也可佐证）。比较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及其程度是人口淘汰机制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人口控制方式及其力度的作用是其次的。

作者：穆光宗，男，196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

一百多年前，一个叫高尔顿的欧洲人因创立“优生学”而名闻遐迩。高尔顿是一个思想敏锐又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通过对当时某些社会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发现当时的欧洲社会存在着不利于人类进化的选择现象，譬如，他在《遗传的天才》一书中曾提到：“某些普遍的社会机制起到了人类自然属性退化的作用。”为此他著书立说，大声疾呼，以期唤起人类对自身前景的关注。

然而，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担忧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相反地，欧洲似乎是更加生机勃勃，呼啸而来的产业革命使欧洲面貌焕然一新。欧洲在工业文明的洪流中接受了历史性的洗礼。欧洲人更强健、也更聪明了，以致于高尔顿自己也深感困惑：“真正奇怪的是，欧洲血管里竟然还能保留足够的好东西，使其种族上升到目前的水平。”

优胜劣汰：人类进化史的主旋律。

转眼，历史到了今天。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人自身的群众性运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从人口素质角度关注城乡二元化生育格局的存在和演变，一种高尔顿式的情绪和担忧又开始在中国酝酿和传播，这就是时下议论纷纷的“人口逆淘汰”问题。

在讨论任何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时，我们应当首先弄清的是这个问题的性质。亦即，对讨论对象的科学界定是讨论必然的逻辑起点。

那么，什么叫“人口逆淘汰”呢？

从现在的讨论看，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总括起来看，所谓人口逆淘

汰系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①抑或也可以界定如下:系指总人口中低素质及零素质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质量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②当然,这里所谓的素质高低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关于“人口素质”,笔者倾向于其外延可划分为身体素质、智力素质(或文化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心理素质)这三个侧面。^③由此可见,考察人口逆淘汰的角度不是单一的。这里顺便指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说法似乎不如“人口逆淘汰”来得准确。这是因为,淘汰本身总是与素质相关的,亦即,所谓“素质逆淘汰”的说法有同义反复之嫌,而且淘汰的主体是人口而不是素质,当然“人口逆淘汰”总会在人口素质的诸侧面上表现出来。

由上,也就引伸出了几个迄今尚有分歧的话题:

“逆淘汰”到底是客观事实还是虚惊一场?

若是一个既存的事实,那么“逆淘汰”在多大范围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提出也许在未来的某一时候才能找到真实答案的问题:这就是,“逆淘汰”在客观上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宏观的结果,中国人口的素质会因此而出现结构性下降的危险吗?

人口逆淘汰话题的引发是与现今的人口控制举措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人口多生多育,而发达地区、城镇地区人口少生少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同志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担忧,长此以往,低素质人口比重会越来越高,即产生所谓的人口素质逆淘汰。

如果这种担忧正在成为一种日趋显化的事实,那无论如何也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事,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衰败,甚至是一种文明的没落!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对此,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基调不太相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⑤以笔者之见,从目前的讨论深度和广度看,双方争论尚不足以辨出个谁是谁非,却因各自的角度、证据和逻辑而似乎各有道理,所谓见仁见智。事实上,貌似对立的双方存在着统一起来以求全面认识的可能性。

二、如何认识“逆淘汰”现象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检索,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论者在探讨“逆淘汰”问题的是是非非时都是建立在城乡生育率相对差异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譬如,侯东民在最近的研究中就是通过城乡相对生育率比值 R/u 的变化来考察“逆淘汰”的(这里 R 代表农村平均生育水平,

① 周孝正:《论人口素质的逆淘汰》,《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② 穆光宗:《论中国人口的质量控制》,《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③ 参见穆光宗:《人口素质新论》,《人口研究》1990年第4期。

④ 以周孝正、陈剑为代表,文见《论人口素质的逆淘汰》,《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冯立天主编:《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第319页。

⑤ 以戴星翼、侯东民为代表,文见《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第310—316页;《人口控制与人口素质‘逆淘汰’》,《科技导报》1992年第8期;以及《对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讨论的几点看法》,《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u代表城市平均生育水平)。①侯东民认为,如果人口控制放大了R/u值,则人口控制确实加剧了人口素质逆淘汰,反之则不是。这里,一个关键的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生育率的差异是否就足以反映“逆淘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侯文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将它作为既定的前提确立的。譬如,侯文认为,在70年代初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之前,我国人口素质已经出现“逆淘汰”,理由就是城乡生育率存在差异。

但上述推断值得推敲。其实这里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城镇人口的素质高于乡村人口的素质。然而,这一假设需要检验。直言之,生育率的差异是否能在今后足以反映出人口素质的差异,这还是一个大可质疑的问题。以笔者管见,这种假设有简单化之嫌,因为这种假设用我们耳熟能详的通俗语言来说,差不多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说法的翻版。这样,建立在这种并不坚固的理论假设之上的实证及其结论自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用生育率的相对差异去简单替代人口素质本身的诸多差异,这是必须澄清的一个基本认识。这是因为:

首先,与人口素质发展关系更密切的不是生育率的相对变动,而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差异。诚然,农村生育水平要高于城镇,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人口比重会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目前正处在农村人口城市化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乡村人口比重必将逐年下将,从目前的72%左右下降到本世纪末的60—65%左右。这样,从动态的角度看,城乡生育率的差异并不会在可预期的未来完全Copy(翻版)在城乡人口绝对分布的比例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它告诉我们,仅从人口角度看,在刻画“人口逆淘汰”时,用人口数这种绝对数构成的差异要比生育率这种相对数的差异更为直观。

其次,城市人口素质高于乡村人口的假设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层面的取舍问题。从文化素质看,大致是成立的,即一般来说,城镇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多于乡村人口。从身体素质看,问题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乡村长寿人口也不少。特别是当我们局限于一个小范围的比较时,那么无论是单项素质的比较或者综合素质的评判,结论都可能出乎意料,这在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甚至出现了乡城差别的发达地区可能是个不争的事实。

再者,我们知道,人口逆淘汰的另一种说法是素质高者少生,而素质低者则多生。这里的素质高低系指文化素质或智力素质。人们的这种担忧其实可转化为这么一个问题:父母一代素质的差异是否必然反映在子女一代的素质上?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迄今尚无充分的证据可以对此作出证实或者证伪的判断。但我们注意到,遗传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形下不如环境的作用。在城乡社会日渐交融的今天乃至未来,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对于农村新生代素质的良好影响应当是可以预期的。

现象地看,局部地看,“逆淘汰”问题是应当引起注意和警惕的。“多生 \rightleftharpoons 劣生”的恶性循环在一些相对封闭、相对落后的社区可能是严重的,如我国的老、少、边、穷地区,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现在我们尚无法得出确凿的判断。但从全局看,从发展的眼光看,“逆淘汰”恐怕是不足为忧的,只要我们在考察人口素质问题时不撇开社会经济发展这一重要的参照系,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优胜劣汰”(正淘汰)将保障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

① 参见侯东民:《对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讨论的几点看法》,《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族去拥抱一个光明的未来。

“逆淘汰”论者认为，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逆淘汰。其依据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越来越高。^①在世界总人口中，发达国家所占比例是不断下降的，1950年为33%，1983年为24.5%，本世纪末预计将下降到20.8%，到2025年将仅为16.8%；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人口比重不断提高，1950年为67%，1983年为75.5%，200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80%，预计2025年为83.2%。这里隐含着—个假设性前提：即经济发达与高素质对应，而经济不发达或次发达则与低素质对应。一般来讲，这无疑是可以接受的。但发达与不发达的划分标准正如人们对人口素质高或低的看法—样，是十分相对的。也就是说，世界人口逆淘汰的判断是根据间接的数据得来的，所以是一种相对的判断。由此我们也就很难进行明确无误的价值判断，谁能据此断言人类开始了结构性退化或者人类的未来正趋于黯淡呢？

具体到中国，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人口比重又是如何变化的？笔者利用80年代两次普查的数据测算了两类地区人口比重的变化（1982—1990），结果是：发达地区人口比重从37.73%下降为37.56%，8年间下降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次发达地区人口比重则从62.27%上升为62.44%，8年间增加1.7个百分点。^②从80年代看，中国的情形和全球范围的考察结果—致，但中国的变化是微弱的。那么，从这种发展趋势看，是否能够得出中国存在全国范围的人口逆淘汰现象呢？笔者以为不能。理由是，—则发达地区和次发达地区的划分是相对的；二则经济的发达程度影响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地用前者的差别去替代后者的差别。

事实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素质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具体表现在：平均预期寿命在延长，婴儿死亡率在降低，文盲率在降低，而平均受教育年限在上升，等等。要衡量人口素质的总体存量水平，通常采用的是国内学界已不陌生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简称为PQLI）。由于这一指数所包容的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均与人口素质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测度人口素质的总体存量水平，所以国内学者也习惯于称之为“人口素质指数”。笔者利用这一指数曾测算过我国若干年份的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结果如下：1964年PQLI值为49.8，1982年为74.4，1990年为79.6。^③若以0—60，60—80和80—100为标准将PQLI值分为三档，则我国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近30年来已从低度发展到了中等偏上的水平。这些数据似乎足以证明“正淘汰”（优胜劣汰）是主流，而“逆淘汰”（劣胜优汰）虽然也有，但不会也不可能是主要的。其实，“逆淘汰”论者也看到了人口逆淘汰有限的负面影响——“从人类发展的进程看，这种人口素质逆淘汰只是影响了总体人口素质的提高步伐，而不会影响全人类素质的不断提高。”^④这种看法是中肯的。

众所周知，贫困和低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从考察贫困人口比例的变化出发，可以说找到了一个能够较好认识人口逆淘汰现象的视角。我们知道，贫困往往意味着营养不良和受

① 参见周孝正：《论人口素质的逆淘汰》，《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② 这里的发达地区包括辽、吉、黑、京、津、沪、鲁、苏、浙、闽、粤（为统—口径，包括了海南省）共11个省市。其余省、市、区则纳入次发达地区计算。但总计数中不包括现役军人的数据，也不包括大陆以外中国地区的人口。

③ 参见穆光宗：《人口素质指数刍议》，《人口动态》1991年第5期。

④ 转引自《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教育机会少，譬如，时下海内外极为关注的“希望工程”其救助对象就是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所以说，贫困和低素质几乎就是如影随形。在这个意义上，贫困人口比例的变化大致是可以较好地反映低素质人口比例之变化的。

如下表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呈下降之势。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90年的0.85亿，减少1.65亿，平均每年减少1375万人。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了3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2.6个百分点。在80年代世界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扩大的情况下，^①拥有9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却取得了反贫困的巨大成就，这是令人欣慰的。分阶段看，1978—1985年，为大幅度减少阶段，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年均减少1786万；1985—1990年为稳定减少阶段，共减少4000万，年均减少800万。据此，有理由认为，人口正淘汰是主要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人口素质的恶性循环圈，重塑了人口素质的正向选择机制，而且这种机制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

1978—199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变化

年份	乡村人口 (万人)	贫困人口 (亿人)	贫困人口比例 (%)
1978	80,320	2.05	30.7
1984	84,301	1.28	15.1
1985	84,420	1.25	14.8
1986	85,007	1.31	15.5
1987	85,713	1.22	14.3
1988	86,725	0.96	11.1
1989	87,831	1.02	11.6
1990	89,590	0.85	9.4

注：贫困人口是指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的人口，而农村居民的贫困线则等于最低食品消费金额除以确定的食品支出比重。参见何焕炎等《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评估和监测》，《经济研究资料》1993年第3期。

看来，在研究“逆淘汰”时，不应忽视“正淘汰”。两者最好结合起来研究，因为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正负两种淘汰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也是正反两种社会选择机制动态平衡的产物。只有当“逆淘汰”上升为主流，超越“正淘汰”并难以逆转时，问题才会真正严重起来。但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史，这种情形可能是罕见的，从长过程看，更是如此。

适者生存，物竞天择。人类的进化、社会的发展大抵也是达尔文式的。

就中国而言，所谓人口逆淘汰，可能存在两种形态，一是智力或文化素质逆淘汰；二是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

在现象上，素质高者少生，素质低者多生；城镇居民少生，乡村居民多生；发达地区人口少生，老、少、边、穷地区多生。就新生代的素质发展来看，少生的容易做到优生优育，素质发展前景看好；而多生的则往往非但不能做到优生优育，反而有劣生劣育的可能，素质发展前景堪忧。但这似乎更多的是理论家一种悲观的推测，迄今尚缺乏有关全国性的经验事实和方法论的支持。所以，将之视为既存的事实实在不妥。因为发达与不发达本身是相对的，虽然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民族差别依然存在，但未来的差别很可能是更高层面上的差别，亦

^② 据联合国1993年3月24日发表的《1992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90年代，世界人口平均每年增长9700万，增长之快、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所有这些人增长几乎都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次发达地区，其中一半以上在最贫困落后的非洲和南亚。贫困地区人口增长快，而人口过渡膨胀又会加剧贫困程度。

即，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总体水平的提高将是预期的。

另一方面，按照我国一些省、区的规定，凡第一个孩子患有严重先天性疾病或后天性伤残，以致影响日后的劳动和独立生活者，可酌情按有关规定生育第二胎。但问题是，生了一个患有严重先天遗传性疾病婴儿的夫妇，再生第二、第三胎仍为病残儿的可能性比一般夫妇大得多。事实上，因为种种原因，允许生第二胎的妇女很难做到优生，结果是难以摆脱“劣生多生”的恶性循环。据四川省万县地区所辖5个市、县第一孩病残鉴定工作的调查，1987年5市、县因第一孩病残而申请生育第二孩的夫妇有1498对，其中小孩被诊断为先天性及遗传性疾病的有815对（也就是不在允许再生的政策框架内），最后却有421对夫妇被批准生育二孩，占51.7%。在815对夫妇中生育的第一孩患严重遗传病的（如痴呆、脑瘫、先天性聋哑等）有338对，其中居然也有181对被批准生育二孩，占53.55%。这样的典型案例虽然不足以反映全貌，但问题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诚如上述，仅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生育率的差异来分析“逆淘汰”现象看来是表面化的，因为不论是发展程度或者生育率的差异都不能直接、真实地代表人口素质本身的差异。显然，我们必须分析影响人口素质发展（正淘汰或逆淘汰）的因素，大而言之，实际上一是遗传的影响，二是环境的作用。或者说，一是优生或是劣生的问题，二是优境或是劣境的问题。

一般来说，人口素质的高低取决于遗传和环境的综合作用。这里的环境是“大环境”范畴，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系统，其中社会环境又可细分为：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如此等等。至于遗传和环境的影响谁大谁小，则是争论的。

以高尔顿为代表的遗传决定论者认为，一二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高尔顿自己通过对双生子研究和家系调查证明了智能的高低主要由遗传决定，据此他主张要通过选择性婚配来减少不良遗传素质的扩散和劣质个体的出生，以便达到逐步改善和提高人群遗传素质的目的。^①

对于遗传决定论，我们可以批评甚至反对。但优生学是一门运用遗传学原理改善人群遗传素质的科学，是一门改善未来人类的精神（包括智力和心理禀赋）与身体的学问，这是无异议的。

与此相反，环境决定论者则认为，遗传素质充其量只是一种生理前提，智能的高低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才逐渐发育和成熟起来的，甚至某些素质上的缺憾还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得到不同程度的补偿，譬如，类似美国现代史上文化名人海伦的故事就是很有说服力的。极端的环境决定论者甚至认为，任何一个发育正常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普通职业者或者罪犯，这要看环境的影响如何。譬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卡特尔曾如是说：“一个达尔文如果生在1809年的中国决不会成其为一个达尔文，而生日相同的一个林肯如果没有黑奴战争的关系也决不会成其为一个林肯。”^②

的确，在个体的水平上，遗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性与养孰轻孰重很难分清。但从人类进化史看，恐怕环境因素是更为重要的。众所周知，素质禀赋相同的人口群体如果处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那么素质潜能的发展水平和开掘程度是很不一样的。环境的演

① 参见潘光旦编译：《优生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潘光旦编译：《优生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变和转换能使“虫”变成“龙”或者相反，这样的事实是令人玩味的。

从影响因素看，上述人口逆淘汰在一定范围内（宏观、中观或微观）是可能产生的，但并非不可遏制，也并非不可逆转。关键是我们所持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眼光，虽然遗传因素较难改变（不过遗传有变异），但更为重要的环境因素是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是在改变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逆淘汰是一种恶性循环（如“多生 \rightleftharpoons 劣生”），而正淘汰是一种良性循环（如“少生 \rightleftharpoons 优生”），人类的兴衰、文明的进退、民族的存亡离不开正淘汰和逆淘汰的共同作用。而环境的优劣可以转化成两种不同的淘汰力（或正或负）。譬如，生存环境恶劣往往意味着经济文化落后，意味着缺医少药，意味着信息闭塞，意味着通婚圈狭小，从而使身处其中的人口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以保障生命的需要，得不到很好的医疗以防御疾病的侵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以促进智力的发育，结果形成“多生 \rightleftharpoons 劣生”的恶性循环。可以断言，发展程度越低，生存环境越是恶劣，那么“逆淘汰”就可能越是严重，这在以“老、少、边、穷”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局部地区存在“逆淘汰”大致是可以确认的。但“逆淘汰”的诱因与其说是高生育率不如说是欠发达的社会经济。

当然，我们也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应当看到：在相同的发展条件下，不同的生育水平对于人口素质发展会有不同的影响。换言之，在上述假设条件下，生育水平越高，则“逆淘汰”的趋势可能会越严重，反之则可能出现“正淘汰”趋势，这种转变可能在理论上存在一个临界点。

依前述，从全国范围看，优胜劣汰是主要的。虽然劣生多生的恶性循环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毕竟少生优生在增多。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口控制的综合作用，恶性循环被逐一打破，并向良性循环过渡和演进，其中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人口逆淘汰的规模和范围，这也可视为人口控制间接地具有提高人口素质的功能。毫无疑问，一种文明越是发达，一个社会越是健康，一个民族越是强悍，正淘汰的机制力量也就越强，反之也就越弱。

三、简短的结语

可以预期，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更加完善中国人口“优胜劣汰”的社会选择机制，对环境系统的总体优化将更加削弱局部地区“逆淘汰”的影响。因为竞争机制的本质就是优胜劣汰，这种激励机制鼓动着、塑造着一种人心向上的社会风尚，这也正是千年沉浮、百年抗争的中华民族选择了市场导向的变革模式之后显示勃勃生机的根本所在。人口素质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素质的发展趋势将是不断提高的，譬如，非农化、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使新一代中国农民的素质再也今非昔比了。

当然，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部分地区存在的“逆淘汰”应当加以关注，未雨绸缪。这是没有异议的。

如此看来，人口逆淘汰论者虽然不致于同“风车”大战了一场，但也是不必小题大作、大惊小怪的。

责任编辑：王 颖